

Japanese
Economic

第二辑
**日本
经济
研究**

主 编 陈子雷
副主编 陆慧海 刘 莹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前 言

《日本经济研究(第一辑)》出版之后,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之间,经济交流和贸易合作仍在未间断地进行着。作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中日两国,与经济贸易相关的政策的出台和变化一直是两国政界、企业界和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第二辑仍然依托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一直潜心于日本经济和中日贸易等方面的研究,拥有优良的人才储备和丰厚的研究基础,在日本经济和中日经贸等领域有着杰出的研究成果。此丛书集合国内外日本经济和中日贸易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以及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和研究员,针对日本经济的改革进程、区域合作、中日贸易的热点问题、日本经济政策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

本书按章节构成,主要按以下的逻辑顺序编纂而成。

第一部分主要关注中日区域之间经济框架和相关政策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由第一章至第四章组成。

第一章“疫情下的日本经济动向分析”,分析了2019年第四季度,受日本国内消费增税计划实施的影响,日本个人消费出现下滑的实际情况。阐述了近期全球经济减速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为了防控经济下行风险,日本政府开始制订和实施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在2020年初,由于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日本政府不得已再次出台紧急应对计划。如何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开始面临两难选择。在这一章中对疫情下的近期日本经济的相关动向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

第二章“中日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分析:‘重回正轨’的十字路口”,从可以高度概括为“政治引领、经济搭台”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聚焦区域合作议题。

日本对华态度的战略性改变及安倍政府的积极表态是对中方始终执着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回应,也为中日两国在区域层面的互动与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并为中日两国未来的深入合作释放了重要的积极信号。但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对日政策及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等各种因素的干扰,未来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难度仍然较大,需要双方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才能继续确保中日关系始终行驶于正轨之上。

第三章“日本在区域一体化上的战略诉求与 RCEP 谈判中的政策取向”,分析了日本政府认为虽然自身的综合国力对华已处于劣势,但如果能够引导 RCEP 和中日韩 FTA 的谈判朝着其所擘画的方向发展,经济上,可借此加速区域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和规则壁垒,更好地进入中国及其亚太国家市场,以收获更多的经济红利;政治上,有利于日本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章立制方面引领谈判的方向,确立对华的规则优势。这种由规则导向所蕴含的“报酬递增”和“框设效应”便是安倍内阁亚太区域一体化政策所寻求的规则收益。

第四章“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日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研究”,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日两国国际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直接利用海关数据分析出口对一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难免有失偏颇,因此出口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分析不宜再简单地运用出口数据进行判断。中日两国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处全球价值链位置及参与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率各有不同。准确计算、横向比较出口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既可以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修订完善提供参考,也可以为中国今后的国际贸易谈判提供依据。

第二部分,主要关注中国和日本宏观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政策,由第五章至第七章组成。

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背景下中日对东盟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新背景,借助经济外交视角,梳理并比较这一复杂变局下中日两国政府对东盟经济外交,探讨中日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新调整对中国—日本—东盟三边经贸关系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展望了中日对东盟经济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第六章“日本对外贸易政策机制——基于日美贸易摩擦案例”,分析了日

本贸易政策如何形成,制定贸易政策的组织与机构,贸易政策受到的各种影响,以及日本政府的应对手段。时至今日,日美贸易摩擦依然存在,但在美国政府内的优先顺序降到继中国、欧盟之后的第三位。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形势下,希望对中国的通商研究有所裨益。

第七章“试论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原产地规则之适用问题”,在《日本和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日本和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的大背景下,各国开始合纵连横,大行双边经贸合作关系,以对抗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力求与美国分庭抗礼。日欧 EPA 毫无疑问将对日本、欧盟乃至全球经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考察日欧 EPA 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其在规则层面的新变化,可以更好地把握国际经贸规则的未来走向。

第三部分,主要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与日本经济贸易的相关研究,以及日本国内的一些观点,由第八章至第九章组成。

第八章“‘一带一路’与中日韩高校的贡献——产学研合作交流新模式探讨”,在中国政府持续推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背景下,对产学研模式的研究。产学研合作及其技术创新的可能模式多样,既有正式合作也有非正式合作,既有长期合作也有短期合作,既有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利用自身科研成果创办企业,也有通过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还有企业根据自己的技术需求与高校联合开发或委托高校开发或要求高校提供咨询服务等。在国家和各区域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让高校更好地参与产学研联合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第九章“‘一带一路’建设下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及中国的应对”,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和亚投行的主要投资内容——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构建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主要目的是与中国展开竞争,一方面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另一方面,随着安倍访华及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向,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又有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前景与空间。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日本持续推进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是需重视且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第四部分主要围绕日本社会经济相关的制度和法律进行论述和分析,由第十章至第十二章组成。

第十章“人口老龄化带给日本服务产业的影响分析”，在日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需求多样化的大背景下，聚焦个人服务业，在探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对日本个人服务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的基础上，考察关于个人服务业的扩大和经济增长、财政健全化的课题，阐述日本老年人再就业制度。希望对中国老龄化进程中个人服务业及退休老人二次就业制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内容。

第十一章“从税改观念之流变观日本税制沿革”，溯源日本现代税制的建立和作为日本税制改革重大里程碑的肖普税制的确立。结合日本税法变迁脉络中重要的税制变革节点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势，把握日本税制演变的内在逻辑、未来趋向，梳理已然解决和仍然悬置的制度难题，并研究日本税制沿革带来的经验启示。

第十二章“日本高龄者雇用政策考察”，研究在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面对不断膨胀的年金给付和劳动力市场人手不足的困境，作为重要解决路径的促进高龄者雇用手段。从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出发，溯源有关日本老龄化雇用政策和法律，整理日本政府促进高龄者就业的措施，结合近年来的政策实绩进行分析和讨论，为今后高龄者雇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探寻路径。

本书在编辑阶段遇到新冠疫情肆虐神州，日本友人积极捐赠防护物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让人动容。之后我国人民也报之以琼瑶，向日本捐赠防护物资。这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和日本人民绵延长久的友好情谊。希望中日两国在未来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可以持续长久。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会给中日经贸关系带来新的考验和挑战，由衷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成功抗击疫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疫情下的日本经济动向分析	陈子雷 1
第一节 出台紧急应对计划,日本进入防疫经济阶段	1
第二节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3
第三节 疫情下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是否影响中日经贸合作	5
第四节 “安倍经济学”是否“曲终人散”	9
第二章 中日区域经济合作关系分析:“重回正轨”的十字路口	陈友骏 15
第一节 中日在区域层面中的互动与合作	16
第二节 日本转变对华区域合作态度的动因分析	25
第三节 美国因素是影响中日区域合作的主要外部变量	30
第三章 日本在区域一体化上的战略诉求与 RCEP 谈判中的政策取向	蔡 亮 32
第一节 制度竞争视阈下日本对华博弈的机会窗口	34
第二节 安倍内阁主导 CPTPP 的战略意图	40
第三节 安倍内阁在 CPTPP 谈判中的政策取向	49
结论	58
第四章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中日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研究	叶作义 61
第一节 问题提出	6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62

第三节	中日两国的贸易结构特征	64
第四节	模型和数据	65
第五节	中日两国出口增加值诱发效应比较分析	68
第六节	出口对服务业的波及效应	74
结论	75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背景下中日对东盟经济外交比较

研究 席桂桂	78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框架	78
第二节	“亲诚惠容”打造“命运共同体”：积极进取的中国周边外交	88
第三节	适应中的新调整：安倍政府对东盟新经济外交	97
第四节	比较视野下中日对东盟的经济外交	106
结论	112

第六章 日本对外贸易政策机制

——基于日美贸易摩擦案例	藤生健	120
引言	120
第一节	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	122
第二节	制定贸易政策的机构	125
第三节	影响贸易政策的诸要素	131
第四节	具体事例分析	132
结论	139

第七章 试论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原产地规则之适用

问题	李桦佩	141
引言	141
第一节	日欧 EPA 之概览	142
第二节	日欧 EPA 的主要诉求	145
第三节	原产地规则的适用	149

第四节 对中国原产地规则的启示	154
结论	155
第八章 “一带一路”与中日韩高校的贡献	
——产学研合作交流新模式探讨	高 翼 157
引言	157
第一节 产学研合作概述	159
第二节 日韩和中国高校传统产学研合作模式及特点	163
第三节 “一带一路”是中日韩深度合作的优秀平台	187
第四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产学研合作交流新模式构建	195
结论	200
第九章 “一带一路”建设下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及中国的应对	孟晓旭 202
第一节 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提出	202
第二节 日本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原因	207
第三节 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推进与深化	212
第四节 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动向	220
第五节 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的前景与影响	227
第六节 中国的应对	237
第十章 人口老龄化带给日本服务产业的影响分析	
.....	聂海松 杨非凡 241
引言	241
第一节 少子老龄化与个人服务业	243
第二节 个人服务业扩张与经济成长	245
第三节 个人服务业扩张与财政健全化	248
第四节 老年人就业	250
结论	251

第十一章 从税改观念之流变观日本税制沿革	王 焯 王家俊	252
引言		252
第一节 前肖普税制时期的日本税制沿革		253
第二节 肖普税制的确立及背离		255
第三节 财政重建时期的根本性税制改革		259
第四节 当代日本税收改革的情状		261
结论		264
第十二章 日本高龄者雇用政策考察	刘 莹	266
第一节 日本人口高龄化现状概述		266
第二节 促进高龄者雇用的政策和法规		273
第三节 近年日本政府促进高龄者雇用措施		278
结论		283

第一章 疫情下的日本经济动向分析

陈子雷

2019年第四季度,受日本国内消费增税计划实施的影响,日本个人消费出现下滑。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减速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对日本经济也带来了很大冲击。为了防控经济下行风险,日本政府开始制订和实施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但是在2020年初,由于突发新冠疫情,日本政府不得已再次出台紧急应对计划。如何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其宏观调控政策开始面临两难选择。本文将对疫情下的近期日本经济动向展开分析。

第一节 出台紧急应对计划,日本进入防疫经济阶段

2020年4月6日,日本内阁府通过了108万亿日元的防控新冠经济对策,其规模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约56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紧接着7日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对包括东京都、大阪府、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兵库县和福冈县在内疫情较为严重的七个都府县采取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以防控疫情蔓延。

1. 出台大型经济对策是经济转向的风向标,即从刺激经济发展转向防止经济下滑

本轮经济对策是2020年以来安倍政府推出的第三轮经济对策。自1月疫情出现以来,日本政府已先后出台了两轮紧急对策。首轮对策于2月13日出台,包括增加预备费在内总额约153亿日元,主要用于支援口罩增产以及加

强边境检测等。3月10日,出台规模为4308亿日元的第二轮紧急对策,用于防控疫情和确保就业。4月6日,面对疫情的持续蔓延,再次通过实施第三轮108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可谓史无前例。

笔者认为,连续三轮的紧急对策更像一个较为典型的抗疫救灾支援计划,其主要目的在于稳经济、救企业、保就业和济家庭,出台时机和尺寸把握较为合理。但是,对策涉及的资金规模虽然多达108万亿日元,但其中涉及的中央、地方财政资金以及财政投融资资金共约39.2万亿日元。总的来说,给人印象是财政资金使用略显捉襟见肘,而且其余资金来源明细也不甚清晰。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这番连续三轮紧急应对措施采取的都是“踩刹车”式的“止跌”型政策,也与之前“踩油门”式的助推型经济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

2. 发布“紧急状态宣言”,牺牲经济增长防范新冠病毒风险

自3月下旬以来,日本国内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4月开始,作为疫情重灾区的东京都日确诊人数也从两位数上升至三位数。4月7日,日本境内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4100人,死亡97人。特别是重灾区东京都已开始面临医疗资源短缺的风险。受此影响,此前一直犹豫不决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7日晚发布了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宣言。

从防控新冠疫情的角度看,安倍政府发布“紧急状态宣言”实属迫不得已。但是,此举也将引发经济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增加和家庭“入贫”的风险。特别是占GDP 2/3以上的服务业部门更是首当其冲。其中,旅游、休闲、娱乐和餐饮行业则将成为倒闭“重灾区”,而占从业人员六成以上的非正式员工将面临遭解雇的风险。同时,高校应届毕业生也将陷入毕业即失业的窘境。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2020年1月日本失业率为2.4%。同时,据日本民间智库测算,在没有实施“紧急状态宣言”的前提下,日本的失业率或将上升至3.3%~5.2%。特别是宾馆和餐饮两个行业在3—4月的营业额将分别减少43%和19%,并出现约100万人的失业者,拉动日本整体失业率上升约1.4%。而在实施“紧急状态宣言”的前提下,不但失业人数将进一步增加,个人消费也将在4—5月减少约2.3万亿日元。因此,以上社会问题能否依靠经济对策来“补漏”,引人关注。

3. “紧急状态宣言”配套防控新冠经济对策,短期成效是关键

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0月至12月,日本国内生产总

值(GDP)扣除物价因素后环比下降1.6%,年率同比降幅达7.1%。从2020年日本经济的运行状况来看,受新冠疫情影响,虽然第一季度日本GDP继续呈负增长的格局已难以扭转,但第三季度经济是否好转才是关键。因此,一旦实施“紧急状态宣言”对防控疫情奏效,第三季度经济将有所反弹,日本全年GDP也将由预期的7.6%负增长上调至4.5%负增长,可以起到比较大的政策效果。但是笔者认为,安倍政府“紧急状态宣言”配套防控新冠经济对策的做法,虽然有利于最大限度减少经济代价,也有利于“止跌”日本经济,但是能否在短期内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有效遏制新冠疫情蔓延才是关键,这也是安倍政府作此决策的初衷。

第二节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受新冠疫情影响,经多次协商,2020年3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正式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将东京奥运会延期至2021年7月开幕。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是否取消这次东京奥运会的担忧,同时延期举办对安倍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次优选择。本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2020年东京奥运盛会可以让“安倍经济学”起到“点睛”效果,但随着奥运会延期举办,其经济效应也将“滞后”显现,还将对近期呈现衰退迹象的日本经济带来不小冲击。

1. 奥运会延期对经济层面的影响

根据3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3%的萎缩,这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所面临的最糟糕的经济衰退。其中,发达国家经济体将出现约6.1%的萎缩。

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预计2020年也将出现约5.2%以上的萎缩。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2019年第四季度日本国内实际生产总值年率同比降幅达7.1%,高于当初6.3%的预期。这一降幅也是五年来的最大降幅。进入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仅2月一个月的访日游客就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8%。海外游客锐减对日本宾馆、旅游、餐饮和购物等服务性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同时,外需的持续萎缩也对日本外贸出口造成挤压。因此,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出现萎缩基本已成定局。第二季度伊始,

随着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宣言”发布,日本国内停工停产企业增加,中小企业倒闭和员工失业风险急剧上升。在此情形下,奥运会延期虽然也是迫不得已,但延期将给场馆保养、设施维护、人员开支、改签商业合同等方面带来6 000多亿日元的经济损失。同时,奥运经济带来预计高达3万多亿日元的直接效果也难以在今年显现。

2. 东京奥运“红利”滞后产生的影响

一般来说,一国举办奥运会有利于推动比赛场馆和周边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其投资乘数效应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根据2019年12月日本国家会计检查院的测算,包括日本中央政府、东京奥组委和东京都在内的各地方相关支出总计已超过3万亿日元,如果包含民间投入的话约为8万亿日元。

目前,虽然绝大部分投资项目已经通过比赛场馆和设施等的建设予以完成,但是对门票销售、设施运营、比赛安保费用等方面的需求则将随着赛事的延期而难以兑现。按照日本央行的测算,延期带来的直接经济效应损失约为1.9万亿日元,将压低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约0.36%。如果2021年能够如期举行,奥运的经济效应也将“滞后”一年,在2021年夏季才能得以体现。

从过去各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经验来看,奥运经济效应一般贯穿奥运会前后。因此,单纯从增加值角度测算,自2016年起东京奥运会的经济效应可以拉动日本名义GDP上升0.6~0.8个百分点,举办年可以拉动0.2个百分点。在过去两年中,日本在名义GDP中已经获得了9万多亿日元的经济效应,如果加上对各相关产业带来的间接经济效应,更达17万亿日元左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通过承办本次东京奥运会带动了政府和民间企业的投资,对实现政府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企业主导的增长战略作出了很大贡献,可谓是对“安倍经济学”的“点睛”之举。按照以上方式测算,如期举办东京奥运会则将再给日本2020年名义GDP带来约1.9万亿日元增量,加上相关产业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更将达3.2万亿日元。特别是在举办奥运会的以后几年,周边设施的商业再开发和投资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奥运红利”。因此,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这“失去的一年”将给日本经济带来较大的损失和心理冲击。同时,2021年能否如期举办奥运仍需取决于2020年和2021年这

两年全球疫情防控成效。可以说,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尚未消除人们心里的担忧。

第三节 疫情下的供应链改革计划是否影响中日经贸合作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制度创新,各项政策所产生的红利不断吸引外资外企进入我国。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持续多年下降的背景下,去年我国吸收外资继续保持逆势增长势头,全年实际使用外资94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再创历史新高,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位。同时,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也已突破100万家。外资外企对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中,日本是我国外资外企主要来源地之一。日本企业在华布局生产经营,对我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就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为日资日企提供了极好的海外发展机遇。

1. 供应链改革计划与“中国+1”方案

金融危机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中日双边关系恶化和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加剧等现象的出现,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开始鼓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在此压力下,日本政府和企业也相继探讨实施“中国+1”等备选方案,以避免供应链过分集中于中国这一“世界工厂”而产生不必要的风险。其后,随着两国关系的转暖,双边投资和贸易规模开始反弹,两国经贸关系日趋紧密,所谓的“中国+1”方案不攻自破,新增投资日企也愈发关注我国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并逐步将开发中国市场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点,以顺应我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战略转变。目前,约有六成在华日企已经实现了在中国市场的现地销售,而产品返销日本的在华日企仅占其总数的30%左右。

进入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中日两国经贸合作也受到很大冲击。两国政府先后启动了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紧急机制,企业面临停工停产,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很大影响。在此背景下,为了抗疫情稳经济,日本政府于4月7日出台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总

规模约 108 万亿日元。其中,斥资 2 435 亿日元用于供应链改革和海外生产多元化方案。在内阁府议决的《新冠病毒感染紧急经济对策》第二章第四节第一部分,即“构建强韧的经济结构”,这部分内容的第一点明确提出了供应链改革计划。该计划强调了针对因新冠疫情受冲击的海外供应链,认为日本有必要基于经济安全角度考虑,将生产基地从“特定国”搬迁回国内或者推动向东盟等国的多元化布局,以方便企业扩大海外生产经营、增强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为后疫情时代继续扩大外需做好准备。日本政府认为,此次疫情初期日本国内医疗防护用品等领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供应短缺现象,主要是其国内供应链“空心化”和海外供应链“脆弱化”所致。日本政府认为,全球疫情蔓延使以上供应链布局受到了严重打击。一方面,为了保证疫情期间本国相关医疗物资及原材料的供应,保障供应链安全,防止市场供应短缺,有必要推动实施供应链改革计划以防范由此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从日本企业的角度来看,由于长期以来受税负和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困扰,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逐步减弱,从全球资源配置角度出发开展海外供应链布局有利于扬长避短,特别是核心生产制造功能的海外转移和业务外包是保持竞争力优势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日本企业布局全球供应链也是必然的选择。自经济全球化以来,日本已通过建立海外生产网络,积极构建供应链体系,极大地满足了其本土和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国内市场的商品需求。经过多年精心布局,目前日本参加全球供应链布局的海外企业达 5 万多家,其中中国和东盟是日本企业的海外主要生产基地。考虑到产业布局的诸多要素,笔者认为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政策举措主要还是应对和防范疫情下海外供应链的风险,对我国是日资企业海外主要集聚地和投资对象国的格局并不会产生根本的影响。

2. 供应链改革与生产线外迁或回归的异同

所谓供应链改革,与供应链布局或调整的概念有着千差万别。简言之,供应链改革的推进主体是政府,实施对象为企业,而后者的推进主体则为企业,实施对象为具体的投资和生项目。企业生产线的迁移或回归应该是企业基于全球产业链布局或调整的需要,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因此,如果将企业海外生产线的迁移或回归简单归结为供应链改革具体成效,则意味着改革计划本身在科学性、合理性等方面存在缺陷。

此次新冠疫情蔓延,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因医疗防护等用品产能不足出现

市场供应短缺、物资严重匮乏现象。基于前述理由,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改革计划的实施来介入企业海外投资生产决策的行为,只能更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政治效应将远大于实际效果。从日本跨国企业的角度来看,其全球产业链布局主要还是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因此本国政府的财政补贴或倾斜政策对跨国企业全球产业布局的吸引力并不大,难以在制度上产生有效的制约力。

根据日本媒体相关报道,至计划发布以来共有 87 家中小企业向日本政府申请了供应链搬迁补贴,补助金额约为 700 亿日元,占总预算的 1/3 不到。其中,57 家企业在国内另设生产线,30 家企业则在东盟相关国家另设生产线。因此,总的来说这次申请搬迁的企业数量并不多,且以中小企业为主。从日本中小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来看,其主要生产和营销对象大都为日本的大企业,也是日本大企业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受日本企业传统“系列”关系影响,一般来说缺乏单独调整海外产业布局的能力和动机。特别是从事医疗防护用品生产的中小企业,其在国内以及东盟各国的生产线仍然较多依赖于我国的原材料,在短期内这一格局也基本不会改变。应该看到,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营商环境、产业体系还是市场前景等因素看,我国都是跨国企业全球布局的重点,这一格局今后也不会有很大变化。因此,以目前我国经济基本面和未来发展前景来看,外资外企大范围撤离的现象不会出现。正如近期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所说,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各国企业多年来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从商务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和日本贸易征信机构对企业的问卷调查来看,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近期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日资撤离情况。相反,结果表明日资企业仍将持续看好中国,在中国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也应该不会有所改变。

3. 探讨在多边框架下共建供应链风险防范机制

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非常之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将出现 3% 的负增长,这也是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首次面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的衰退。其中发达国家经济体将出现约 6.1% 的负增

长,新兴国家经济体将出现1%的负增长。

为了应对全球性经济衰退,发达经济体政府纷纷出台应急性政策以防经济下滑。其中,量化宽松是货币政策的主基调,而减税和救济企业与家庭则是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尽管如此,发达经济体个人消费、企业投资和进出口下行趋势仍难以避免。为了转嫁国内矛盾,部分国家政府的疫情政治化倾向也愈发明显。一般来说,当全球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战争冲突、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时,如何避免海外产业链风险防控将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部分发达国家政府担心本国企业在全产业链布局中过度“单一化”所导致的“断供”“掉链”等风险问题的想法不难理解。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国内政策引导和国际合作两方面着手推动。首先,从国内政策引导方面来讲,为了做好海外供应链的风险防控,政府可以适当引导企业调整长期投资和生产计划,在全产业链布局中选择适度分散风险、进行部分调整。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必须遵从市场规律和企业的自主选择,不宜单纯以行政手段干扰和打乱全球分工和产业布局。其次,从国际合作来讲,面对短期医疗物资的短缺现象,各国政府可以在多边框架机制下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加强产业互补、合理配置资源,特别是在加强产业链安全管理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链风险防范的国际合作,在全球多边框架下共同建立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防患于未然。事实证明,依靠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完全可以实现相关物资的供求平衡。我们看到,此次疫情下在相关国家出现的医疗防护用品等物资供应短缺是短暂的、一过性的现象,并不具备持久性。相反,在商品市场的供求原理作用下,以各国企业为主体的全球供应链可以充分发挥其供需调整能力,能够在需求迅速增加的情况下迅速调整产能。面对暂时的供求缺口,只需要相关国家政府加强国际合作、构建紧急态势下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实现短缺物资的共建、共管和共享,则完全可以弥补短期供求失衡的“市场失灵”现象。从以往经验来看,每次出现全球经济萧条时,一定会有一些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因素采取一些“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对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各国经济复苏有害无益。从全球发展视野来看,今后在多边框架下加强合作,增进共识,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已是大势所趋,“逆全球化”的言行也必将受到世人唾弃。